

近代中国知识人的海权论：林子贞与《海上权力论》

陆 烨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摘要：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海权论专著，是近代知识人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下，首次以中国的视角完整而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海权问题。本文介绍了林子贞的生平思想与《海上权力论》的主要内容。闽台家乡的海洋文化、留学日本而得的国际法思维和海洋思想、归国后激发的爱国主义情怀让林子贞相比同时代的知识人有着对中国海权更独特和深刻的认识。《海上权力论》首先从学理上厘清与辨析了海权论的概念，并从研究内容和视角上丰富了国人所急需的海权论知识。林子贞以知识人的视野，从回顾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反思了中国海权不振的危害，并进一步反思了当前中国海权观念的落后；从国家环境、民族文化、社会观念等更深的层面审视了中国社会制约海权的因素，从而探求中国海权观念落后的根源；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角度，论述了建设海权与振兴国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中国重视海权的重要意义。《海上权力论》以提醒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宣传正确的海权观念为要旨，在近代中国海权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因近代中国知识人本身的局限性，而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

关键词：海上权力 海权论 知识人 林子贞

晚清以降，西方势力最先从中国沿海叩开国门，使中国人对海洋与国家命运的关注逐渐提升，海权观念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变。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提出注重海防、与敌战于外洋的思想。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等封疆干吏在洋务运动中，进一步提出较为系统的建设近代海军、实施近海防御以守土保国的设想。这些早期的海权思想，仍然基本囿于中国传统的海权观念。

世纪之交的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人对海权认识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的“海权论”也开始由日本传入中国，并由新知识人群体开始，引起了广泛的探讨和倡导。特别是留日学生群体，获得了更丰富和完整的西方海权理论

知识，见识了日本海洋强国的历程，激愤于中国的民族危机，将大量海权论的日文著述翻译传入国内，成为 20 世纪初中国传扬海权论的主要力量。这种产生于西方的军事力量与海洋贸易伴生关系的理念，通过新式媒体逐渐开始在民国社会各界成为潮流，作为知识人的梁启勋，作为政治人物的孙中山，作为实业者的张謇，作为军事将领的陈绍宽等，或著述、或演说、或通告，积极阐述海权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

然而，近代以来的海权思想也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一是在海权范畴上过于片面和碎片化，尚未有对中国海权问题完整的述论；二是或根据中国传统经验，忽视世界海权潮流，或多搬照西方海权论，不重视中国的传统与问题；三是过于注重提出的见解和方案，对于中国海权问题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进行探讨。近代中国人的第一部海权论专著——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本文试图从作者的经历思想与著作的主要内容入手，深入考察其思想主旨、思想特点和学术价值。

一、林子贞的生平与经历

林子贞，又名林本元，台湾台北人，生于 1896 年日本初据台湾之时。据林子贞自己回忆，其家族是清朝时由福建同安地区移居台湾的，他是渡台后的第三代。幼年时期丧父，林子贞半耕半读，生活颇为清苦。后借机会来到了日本神户经商，为神户华商谊美商行员工。在日本时弃商就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于 1922 年 3 月毕业，获法学士。同年因经费缺乏、疾病缠身，没有继续深造，离开日本，经朝鲜到中国。后多次在中国南北游历，在北平居住时间居多，曾在京师国语传习所学习国语，也曾担任北平《远东日报》总编辑。1929 年回台湾为养父奔丧，后供职或投资于基隆暖暖煤矿。1930 年往台南，任《台南新报》汉文部主编等职。台湾光复后，林子贞选择从政，任省政府财政厅专员等职。1960 年退休，被聘为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台湾研究所理事。¹《海上权力论》是林子贞在北平任《远东日报》总编辑时所著，由三星印刷局于 1928 年发行。

以林子贞的经历而论，自幼接受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毕业于西式学堂，推崇新知识与新理论，就职于新式传媒业，注重舆论传播，属于典型的中国近代知

¹ 《林本元先生自传》，1970 年 5 月，第 2 页。

识人。¹但其经历的一些特殊性，又对其海权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首先是林氏家族世居的闽台地区的传统文化赋予了他海洋经世意识。福建是中国古代以来海洋文化发达的地区，明清时代更是造就了海洋贸易的繁盛局面，出现了郑氏家族等著名的海上商业集团，以及蓝鼎元等一批具有海洋经世观念的士大夫，而福建迁台的移民更是具有艰苦开拓的海外闯荡精神。福建地区也是中国近代海洋事业的始源地之一，众多闽籍人士成为中国近代海军最初的建设者。从林子贞的思想上看，他对闽台地区文化及其祖辈先民的精神是有着相当的热爱与推崇的。在其退休之后的私立中国文化学院任上，他编纂了《惠安县志提要》、《闽南方言文艺》等一大批地方历史文化的文籍²，弘扬闽台文化。在其著述中，林子贞多次赞扬以闽台地区为代表的南方人亲近海洋、敢于跃出海外冒险的精神，并结合西方历史和理论，认为这种海洋文明培育的精神和意识，是提高国民海洋素质，以加强中国海权力的重要因素。

林子贞的日本求学经历又给了他国际视野与国际法思维。东京明治大学创立于1881年，推崇“权利自由”的校训，偏重西方和日本法学的教育，在二战前是日本著名的法学名校，与中国学生也颇有渊源。甲午战争后，中国留学生开始进入明治大学，注重法政领域的学习³，章宗祥、雷奋、富士英等近代著名人物都曾在这里留学⁴。林子贞进入求学，正值该校升级为明治大学的鼎盛时期，已分为法学、政治、商业与经济四大部，林子贞正是就读于法学部而获得法学士学位。笔者尚未找到林子贞在明治大学的学制资料⁵，若他先读了预科的话，则需要学习日文、汉语与两门西方语言，以及历史、地理、法制等科目⁶。在本科阶段则有宪法、民法、西方法等必修科目，以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选修科目。从林子贞在《海上权力论》的论述中看，他不仅对于西方各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相

¹ 关于近代知识人的身份特征问题，可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贵阳文史》2007年第5期；李长莉：《洋务事业中第一代新式知识人材群的形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初生形态研究》，《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

² 刘宁颜总纂、黄渊泉编纂：《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十·艺文志·著述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版，第660页；《林本元先生自传》，1970年5月。

³ 当时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自(明治)二十七、八年战争后，清国学生来我国留学者已有二百余人，其中多数入成城学校、陆军幼年学校、士官学校等学习军事，其他入东京帝国大学、东京专门学校、灰应义塾等校者亦有若干，但单纯修习法律学者未有一人。近日安徽吕烈烟始入明治法律学校，他自二十九年以来赴日学习日语和普通学，这次有志专修法律学，实为清国法学生之舊矢。”摘自《清国学生法律学》，《读卖新闻》明治三四年十月三日，引自明治大学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明治大学百年史》第一卷，明治大学1986年发行，第827页。

⁴ 明治大学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明治大学百年史》第一卷，明治大学1986年发行，第828页。

⁵ 笔者在明治大学校史资料的中国留学生档案中并未查到林子贞的信息，判断他应为日据台籍身份就读。

⁶ 明治大学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明治大学百年史》第二卷，明治大学1988年发行，第95页。

当熟悉，而且非常注重从法学特别是国际法角度解读海权问题，这些学识与其留学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当时留日学生对西方海权思想的推崇，林子贞应也是这时候接触到海权论的。

林子贞回中国后的时局见闻，也带给他对中国弱势国力的愤慨与担忧，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林子贞至北平后从事新闻工作，著述颇多，特别关注中外关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当时中国因羸弱和落后，在中外冲突中屡屡吃亏，求学时期接触到的世界强国的理论与经验，与中国落后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因此他的时事评论中既有以海权理论和国际法知识对事件的严谨分析，又充满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例如 1926 年在《顺天时报》连载的《海军力的权威》、1928 年在《远东日报》连载的《公论短评》、1928 年在《台南新报》连载的《战后世界各国新形势》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始末记》。在《三一八惨案始末记》中，林子贞既从国际法的角度理性分析了中外双方各自的据理和理亏之处，也指出在双方都不占据法理优势的情况下，西方列强正是凭借其在中国沿海的海军力优势，逼迫中国让步。中国由于国力不振，海权不兴，让外人“乘隙操纵”，只能任由“崇欺鬼笑”。国际法理与海权力量相结合，中国内政与外交相结合，是当时林子贞分析中国问题的主要思路，《海上权力论》也延续了这一风格。

开拓、开放、重商的闽台地域海洋文化，负笈东瀛所接受的国际法与西方海权思想，以及在回国后感受到的民族屈辱落后的危机意识，构成了林子贞撰写《海上权力论》时的影响元素。他在序言中表示，写这本书的缘起，正是激于对中国备受欺凌、四分五裂的现状的担忧，认为以海权来强国的落脚点，在于改变广大国民的海权观念上面。强调国家生死存亡相关的各观念中，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世界大势，无论是为国计还是为个人计，“没有比海上权力再紧要，再痛切的”。一方面海上权力的观念在列强各国深入人心，“其关系差不多跟他们日常生活所必要的面包、米麦相似的”；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国家的国民，却对海权思想无关痛痒了，所以导致“国势的趋缩，不能自存”。因此此书的目的，一是要向民众传播海权思想，“或例举、或力述海上潜势力的大意”，让同胞都知晓其于国于民的益处；二是论述海权论与中国的关系，让同胞在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再继之以独立强国、抵御外辱的行动，“那末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成功的日只

可就不远了”¹。《海上权力论》共分七章：第一章、海上权力的意思；第二章、海上权力与国防的关系；第三章、海上权力和陆上权力的比较；第四章、英国的海上权力；第五章、英国海上权力致大的要素；第六章、法国扩张海军力的径路；第七章、各国扩张海上权力的目的。就内容而言，前三章主要是介绍和厘清西方海权论的概念和主旨，厘清海权的概念和内涵；后四章是以西方海权作为映照，通过海权视角来观察和剖析中国。

二、厘清知识概念和丰富海权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海权论思想大量传入国内，是为近代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其知识传播也存在着概念不清、内容不完整等特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各界根据自己的理解或需要，或择取“海权”概念的一部分，或以其相关因素代指，来进行阐述。当时各类书籍报刊上的“海权”概念纷繁复杂，根据学者研究，有“海权即海军”、“海权即制海权”、“海权即领海”、“海权即海洋经营权”等²。这些著述在推动中国海权思想高涨的同时，以“海权”这一新名词滥为指代相关的各类因素，反而混淆和削弱了其内涵。

作为知识人，林子贞的首要贡献就是在学理上清晰阐述了海权理论的概念，并辨析了被混淆的各类相关概念与海权的关系。近代海权论的创立，一般以马汉的《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于1890年出版为标志，现代学者将其基本逻辑链条概括为“通过强大海军获得制海权—控制海洋通道—控制海洋贸易并从中获得巨额财富—财富反哺海军建设并最终获得世界霸权”，即以海军力量保障国家财富的积累，财富又促进了海军的强大，两者形成良性互动。³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对于海权的阐释却普遍集中于以海军夺取制海权的环节。1903年梁启勋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中指出：“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⁴这是较为贴切的论述，但仍未有清楚的概念解释。林子贞以“海上权力”来定义海权，并分为两个层面：在狭义上说，海

¹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1928年版，序言。

² 可参见周益锋《海权论的传入和晚清海权思想》（《唐都学刊》2005年7月）、高月：《近代中国海权思想浅析》（《浙江学刊》2013年第6期）。

³ 高月：《近代中国海权思想浅析》，《浙江学刊》2013年第6期。

⁴ 梁启勋：《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新民丛报》1903年第26期。

上权力即“国家在海面有把握、有制海的力量”，亦即海权概念的应用方面；在广义上说，包括了武力支配海洋的能力和商业航海的能力，并阐明了两者的依存关系，因为武装力量“跟着商业航海的发达，方才能够巩固他们的基础”。¹这是当时较为清晰而完整的对于海权概念的阐述，最接近马汉海权理论的本质，同时也厘清了“海权”与“制海权”的区别。

厘清“领海”与“海权”的关系。由于中国海界的不明晰，近代中外领海问题频发，在中国朝野的舆论中，又常将“海权”理解为“领海”及其管辖权。1907年葡萄牙侵占中国澳门附近领海事件中，《外交报》刊登《力争海权》一文，称：“澳门葡兵此次擅行越界，迫令中国渔船改泊澳门，并称该处海权全归葡国管辖，实属有违约章”。林子贞在《海上权力论》中，介绍了法律意义上的“领海”与“外海”的定义及其历史由来。“领海”是由国际法规定的，具有国家主权和排他性的区域范围，而国家在自己的领海具有法律赋予的管辖权，比如他国船只进入时的许可、指定淀泊地以及入港税征收等。“外海”则是本国领海之外“大共产、大公有”之海，在法律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管辖权，但确是各国进行“海上权力”较量的角逐场。这个角逐场中，各国施行积极的战略，利用手中“活跃的利器”，来“取了海上权力，来管束在海洋上的使用范围，先占天涯海角的主权未定、国势未定的地方之商业利益和特权”，以此形成在本国领海之外、法律之外的“潜势力”。²林子贞阐明并辨清了作为国家力量意义的、潜在的“海上权力”与作为法律概念、显性的“领海”的涵义区别及其之间的关系。

厘清“海军”、“商业”与“海上权力”的关系。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将“海权”等同于“海军”的看法最为普遍，众多报刊文章专注于各国海军军舰的数量，以此来衡量各国海权的优劣。1902年的《竞争海权》一文就认为，各国海权之竞争，即海军之竞争。³林子贞在论述海权战略时，提出了夺取海上权力的“活跃的利器”这个概念，这个利器既能抵挡外来的侵略，又能保护商船去海外获得利益与特权。这个“活跃的利器”包括了“海船”和“军备”，“海船”则又包括了商船和各类军舰，“军备”是国防上的要件，包括海防、陆防与空防的军备，而这两者中的军舰与其他海防军备则构成了海军，林子贞称之为“海军力”。海

¹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1928年版，第1页。

²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1928年版，第3页。

³参见高月：《近代中国海权思想浅析》，《浙江学刊》2013年第6期。

军力是海上权力的主体，有一部分海军力在海洋上，就可以占了一部分的势力¹，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商业贸易。“商船”没有战斗力，但却是水运的利器，在现代贸易中也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对于国运的兴衰与国势的伸张，大有影响”，可以“抵制外人，奖励输出以保护国内的工商业和开拓外界的财源，取了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来延长自国的势力”²，也包括增强海军力，是为海上权力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在这方面的论述中，林子贞阐明了海军和贸易在国家海权中的地位，并着重指出作为海上武装力量的海军是为海权的主体，而不是其本身。

对西方海权历史的介绍，是当时众多传播海权思想的著作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对各国海军发展、海上争霸战争的记述繁多详尽，对各国如何发展海权战略的战略规划与内政建设则着墨不多。这种缺失也与当时将“海权”等同于“海军”等概念的片面认识相对应。林子贞在《海上权力论》中第一次对西方海权强国的发展战略与内外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过“英国的海上权力”、“英国海上权力”等大量篇幅叙述与分析了近代海权强国如何运用正确的海权战略与政策带来国家的崛起与强盛；也用了“法国扩张海军力的径路”一章叙述了法国海权政策从正确到失误，以致国家海权从鼎盛到衰败的过程；在《各国扩张海上权力的目的》一章中，叙述了日本、俄国等后起国家在新时代下采取的海权政策。

对中国海权问题的深入探讨是《海上权力论》一书最具价值的地方。清末民初中国所面临的海权危机，让众多有识之士积极引入和传播西方海权理论，然而对西方海权思想、海权争霸历史介绍较多，以海权论的视角观察中国、将海权论中国化方面却非常罕见。西方理论家们所建构的海权理论，是建立在以西方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的，在某些涉及东方海权的问题上，也以西方强国的视角来进行论述。西方海权扩张对东方世界造成的冲击、落后民族如何检讨和应对海权问题等中国人所急需了解的议题，则往往谈出他们的视野。这方面涉及研究的是梁启勋的《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谈到了世界海权争夺对中国的影响，但仍然止步于浅鲜的层面。孙中山在其演讲和著述中多次提到中国的海权建设的具体政治与经济措施，但较为零碎。林子贞在全书中处处以中国为探讨对象，从历史危机、国家现状的表面，到政府决策、领导者意识的层面，再到民族传统、国人习性的更深层次，以及对中国发展海权之路的期许。在论述西方海权历史时，

¹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1928年版，第7页。

²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1928年版，第4页。

也处处以中国作为对照,将这个落后的东方陆权国家放到海权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剖析,来反思中国、审视中国和展望中国,是为对当时世界海权论最好的补充。

三、反思中国：陆权国的海权劣势与危机

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各国在东亚的海权争夺日益激烈。马汉在1900年发表了《亚洲问题》一文,论述了列强的海权政策与中国等亚洲地区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应采取的策略。面对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中国学界已经感受到古老中国面临的海权危机。当时诸多海权论述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世界海权争霸进入“太平洋时代”。梁启勋在1903年就提出,太平洋海权问题为世界上最大之问题。¹孙中山也意识到:“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运命者也。”²林子贞也认为,“各国的海上权力,古来在太平洋最盛,慢慢着由大西洋移转到印度洋,现代差不多蔓延到了太平洋上”。³以新的海权时代为背景,林子贞在继承马汉思想的同时,又将其理论结合近代中国实际,对当前中国的海权危机进行了细致分析。

林子贞在海权视角下反思列强侵华史,认为近代中国沦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是中国的海权挡不住西方海权扩张的结果。因为西方国家追求海上权力以伸张国势,必然在全世界追逐海洋上的潜势力,当海上权力争夺延伸到太平洋时,必然要与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各国、同样争夺潜势力的对手们发生纠葛。当面对东方各国的锁国政策时,外交一但破裂,西方国家就要用战争来解决。被征伐的国家如果没有相当的海上权力,必然会被侵入而打开国门,被掠去“地皮和工商业上优先权的买卖”来增强他国的实力。近代中国的命运就是如此,“中国作为东洋的屏垣,因为缺乏海上权力,所以挡不住西欧国力东渐的危险”。因此,中国被迫签订的江宁、瑗珲、天津、北京、伊犁、马关、辛丑、西藏和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都是受到列强海权力扩张的结果。⁴

马汉在《亚洲问题》一文中,对中国海权问题作了分析与预测:一、海洋将促进中国贸易的发展,而从入海口一直深入中国内地的长江沿线最适合海权立足

¹ 梁启勋:《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新民丛报》1903年第26期。

² 孙中山:《〈战后太平洋问题〉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9页。

³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1928年版,第6页。

⁴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1928年版,第5页。

与发展；二、在中国展开竞争的主要列强中，作为海权国家的英、美、日会利用海军优势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据点，为连接世界海洋打开自由通道，并从沿海地区往长江各段所在的内陆地区延伸海权。作为陆权国的俄国将从内陆由北往南向中国沿海推进，去获得通往海洋的通道；三、除日本之外的海权国家由于军事基地过于遥远，更多将扩张寄予自由商业之中，其次才是通过海军武力来实现。商业和财富积累处于劣势的俄国，由于离中国及其首都更近，更容易采取扩张和侵略的行为，利用陆军来禁止他国行使权利或获得独占权。¹

马汉的理论被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普遍用来解释列强在中国打开门户、划分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²。林子贞则认为，从完整的海权论角度来看，列强打开中国国门和占据租借地仅仅是海权扩张的初步阶段，世纪之交列强在中国奉行的“铁道政策”正是海权向内地延伸的后续模式，同样是海权扩张的组成部分。英国在甲午战争之后获得了多条铁路的投资和借款权，正以香港、上海、天津等租借地，以及缅甸等殖民地作为沿海据点，以这些据点为中心向中国内地扩张。这些已成、未成和规划中的铁路，使英国在中国的铁路线上占据了六分之一的势力，也使英国的海权相当地成功延伸入中国的内地，攫取了采矿特权，形成与海上力量相配合的陆上网络，并遏制了竞争对手的海权力量在南方富庶地区的扩张，是为当时最成功的海权战略。俄国则从本土修筑了两条向东方延伸的铁路：一条是西伯利亚铁路，在攫取了中东铁路特权后，向旅顺和大连两个太平洋沿岸据点延伸；另一条是穿越中亚的中亚细亚铁路，由奥伦堡至塔什干，直达中国新疆的伊犁，在中国境内分西、北、南三个方向向新疆、蒙古和成都延伸，与其本身、西伯利亚铁路、中国西南铁路网相连，以图控制中国北方地区及其矿产资源，并获得太平洋的入海口，在长江流域南下隔江与英国对峙。³此外，其他后起国家也在尽力谋划在中国的铁路战略，例如德国的铁路战略就是在欧洲连通奥匈帝国，再通过土耳其越过达达尼尔海峡，经由西亚的波斯进入印度大陆，从西藏进入中国，从兰州至西安、开封、济南，最后与其在胶州湾的海军据点相策应。

在中国早期的海权论学者中，大多聚焦于西方如何用海上力量打开中国国门

¹ 马汉：《亚洲问题》，详见马汉著，李少彦、董绍峰、徐朵等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457-515页。

² 梁启勋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中，提到了列强各国窃取旅顺、威海卫、胶州湾，经营香港、秦皇岛等地，正是海权为商业在北太平洋沿岸向中国内地打开门户的表现。

³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1928年版，第33页。

与占据沿海据点，但仅止于此，倾向于将西方海上权力看成是打开中国海防大门的工具，其本质上仍是单一的海权论，未把 19 世纪晚期西方海权侵略的新动态揽入视野。林子贞以其完整的海权论视角，明确指出了世纪之交西方的铁路战略，正是其海权由中国沿海深入内地的新形式，提出西方的海权扩张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是在对华侵略中与其他政治、经济手段相配合持续深入的过程。

林子贞同时反思了当前中国海权的落后，总结出三个导致中国海权弱小的错误观念。一是传统时代以来的“单臂国防观”观念。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自古以来更注重陆上权力的保持，长期加强陆军战备以应付陆上强敌，对于海上权力极为忽视，常采取海禁这样的消极措施。但世界进入海洋时代之后，海上权力就比陆上权力显得更为重要，海上的战备亦比陆上的战备更为重要。东邻日本已经转变了观念，提出“隔海我陆地的保护者，就是海军”的观点，海军力在国防上也占了首要的地位。¹但是中国人仍然没有被点醒，北洋水师覆没之后，至清朝灭亡仍着力整顿海军，导致中国国防始终缺失这一臂之力。而中国内陆地区的人，更是缺乏海权意识，没有扩张海军的兴趣。²这方面，林子贞的思想与当时疾呼注重海军建设的孙中山、梁启勋、陈绍宽等诸人相近。孙中山同样批评晚清政府对海军整顿不力：“惜乎甲申、甲午两次挫败，兵船毁失殆尽。而满清政府既不能整顿于前，复不能补救于后，一路不振，日趋腐败。”³

二是民国主权未统一下的“对内国防观”。民国之后，各方势力重视建设海军。但军阀内战阻碍了国家的统一，制约了中国海权的向外发展。林子贞认为，海上权力主要是一个国家向外拓展的能力，海权国家的武装力量都应该是对外的，是“为其国家争人格，争独立自由而奋斗”，而当前中国的军队是为“其徒党阀族与个人争势利而奋斗”，“甲省排斥乙省，乙省排斥丙省，陆军部不过时当了各省交战军队的中人”。海权国家的战争目的，是为了获得海上权力和保障国家获得财富，而中国的内战结果则是削弱自己的国力，导致民生涂炭，打一次仗，“多扰乱了中国一回，国内的生产和工商业”，“决没有想要超越海外发展的意思”。因此主权统一是国家争取海上权力的前提，否则无法形成一致向外的力量。林子贞运用海权论学说，将海上权力与中国主权统一相联系，比当时单纯呼吁加

¹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7 页。

²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8 页。

³ 孙中山：《在福州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44 页。

强海军战备的学者和军方人士显然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林子贞因此对积极宣传抵制列强海权、北伐统一中国的南方国民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和关注。

三是当时国民政府领导人错误的“以海制陆”的海权战略思想。当时国民政府视海权强国英国为假想敌，蒋介石于1925年6月在军事委员会作了题为《完成革命必先打倒帝国主义》的演讲，构想了中英开战时如何应付侵略的方案，是为近代中国高层首次阐述如何遏制海权国入侵的战略思想。林子贞认为，蒋介石立足于“据大陆与他相持”的以陆权制海权的错误思想来指导中国抵抗，不仅不会如其乐观的预期“我们革命成功的日子就不远了”，而是将遭受严重的失利。蒋介石的第一条战略是“离岸作战战略”，选择在英国海军力之外的空间作战，让其海上权力失去优势，“因为英国是海洋国，所恃而无恐的武器只有强大的兵舰与大炮，离了海岸一百里的地方作战，他兵舰就失其效能”¹。林子贞认为，这种“离岸作战”的思想极为短视，当海权国的军队离岸作战之际，说明中国的防线其实已经破裂，英国海军已将中国沿海沿江的军港、要塞、城市占领或者摧毁，中国的战争能力已被大大削弱。²蒋介石的第二条战略是“后勤遏制战略”，选择在远离海岸线和铁路线的山区作战，让英国的重武器和军用品运输遇到困难，甚至认为：英国人是惯吃麦粉，不惯吃米饭的，但后勤出现问题，在南方无法征发到多少麦粉，必将陷入困境；英国人也穿不惯草鞋，走不惯山路。³林子贞认为，蒋介石的海权思维过于单一，海上权力不仅仅是海军战备，英国作为老牌海权强国，为海上权力服务的其他配合力量也非常强大，陆上军事能力、交通修筑能力、后勤运输能力均有保障，“英国的大炮移转不动，那末英国的小炮和手铳的力量，难道中国的小炮、手铳就能赢过他妈？中国的交通不便，英国的兵士就不能通过吗？英国人不会穿草鞋，难道穿皮鞋就走不了山路吗？粮食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不能供给他，也有外国的商人做买卖的”⁴。林子贞指出，中国没有强大的海军力，是挡不住西方力量向内陆延伸的。蒋介石的第三条战略是“人民战争战略”，认为在中国国土上离岸作战，中国人不愿意为英国人做事，“中国同胞不愿替他做挑夫”⁵，并将陷入中国人民反抗的汪洋大海之中，“因为与人民

¹ 金成编：《蒋中正全集》，民族出版社1937年版，第213页。

²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1928年版，第10页。

³ 金成编：《蒋中正全集》，民族出版社1937年版，第213页。

⁴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1928年版，第10页。

⁵ 金成编：《蒋中正全集》，民族出版社1937年版，第212页。

利害相反，不仅不能得人民之助，且遭人民热烈的反对！无论他的外援如何强大，总敌不过民众反抗的力量，所以他的结果总是失败”¹。林子贞认为，当前实施“人民战争”的战略并不可行，中国民众与军队没有受过爱国主义的教育，“民智未开，千百人中，实实在在能晓得其中的底细的有几个？而且好些军阀，还不肯舍身为国，难道就没有一班的中国人情愿替老番来和我们中国人打仗吗”？²林子贞举了庚子事变时中国人协助洋人的例子：“谁晓得庚子年首先入北京的，并不是外国兵，实在是英老番所雇用的我们中国广东的潮州兵，不但是挑夫，军队都有情愿替他来和我们本国人打仗的。老番只有拿钱来收买我们不明不白大事、不爱护国家的军人，来和中国打仗也就够了，又何必多费心力去学了穿草鞋呢”？³林子贞认为，中英因省港罢工交恶后，英国并未利用海军力入侵中国，是因为英国担心对华贸易衰退、远东殖民地广阔导致海军力不足、欧洲列强制约等原因，而不是因为受制于蒋介石所说的中国具有的优势，中国其实无法抵挡海权国家的入侵。

对中国当时的海权现状的分析，各界关注者普遍集中于政府对海军建设重视不足、无力保护领海等方面。林子贞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提出，中国海权的落后，是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背后所依托的从民间到高层的思想观念的落后。

林子贞认为，正是如上种种原因导致现今中国的海权危机重重，既在国内受制于人，更无法向外发展。中国的海上权力无法自己掌握，“大半属在外人手里”，商船为代表的商业力量，无法与他国竞争，以军舰为标志的海军力，无法抵抗外国海上权力的入侵，“（中国海军）只会打中国的炮台”，“中国的炮台，只会抗敌中国的兵船”，“中国的灯台，只会照亮着中国的境内”，“中国的境内，保不住中国的主权”，因此“万不能制止外国国势的入侵”。⁴海权强国的海上战备能保护本国的工商业安全，运筹国家的财政和民间生产力的丰富。比如外国海军战舰常驶到中国的港口来保护侨民，而中国海军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军备，“若再不扩张奋练，不如将他当渔船用，来补些利益，省白吃完了中国许多的粮食”。⁵海权强国注重海上政略，例如英国历来在外交和军事上审时度势，纵横捭阖，制

¹ 金成编：《蒋中正全集》，民族出版社 1937 年版，第 212 页。

²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10 页。

³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10 页。

⁴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11 页。

⁵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12 页。

约了其他国家的海上权力。对于侵略中国，英国在外交、内政、宗教等方面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则根本没有海上政略，不仅没有向外拓展的方针，外交上也频频失宜，战略要地尽失，比如清朝失收印缅，沿海地区落入外国势力范围。¹因此，当今中国若不赶紧重视海上权力，中国“依然是个世界新形势角逐市场的落伍者”，“我们主张扩张海防的急务，较陆防还重要”。²

四、审视中国：第一弱国的海权桎梏

林子贞认为，中国海权的落后是在思想观念、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落后，这表明中国社会本身的一些特点和因素与海上权力的发展产生了矛盾，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中国海权不振的深层根源。马汉在其理论中提出了海权兴衰的主要六个条件：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的特点。³林子贞也根据这几个方面来论述，采用了将中国与海权强国相比较的论述方式。林子贞认为，当前的海权列强的顺序，为英、德、法、美、日、俄、意、奥，而列弱方面，“中国可比是算第一不算第二的”⁴。林子贞对于英国推崇备至，认为海权国列强中，“英国的海军力最旺盛”，⁵促使英国海权兴起的各项条件，正是中国这个第一海权弱国值得思考的。在此书的第四、五、六章，林子贞以英国作为正面典范，辅之以法国作为参照，来审视中国这个海权衰弱的古老民族，对导致其衰弱的各项要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中英地理上的地位差别，导致了大陆思维与海洋思维的不同。林子贞认为，中英两国首先是岛国与大陆国家的传统思维区别，这是由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英国作为小小的岛国，对于发展海权来说，却具有巨大的思维优势。首先是对海洋的重视程度不一样，英国人专注于海洋利益，因而不得不扩张大海军，来拓展海上权力和利益。相比而言，其他欧洲大陆的沿海强国则要兼顾陆上与海上的利益，力量分散导致海上权力不如英国兴盛。中国同属于陆海复合型国家，长期以来海上获利更少，受到威胁也少，故“不晓得有防海上的要务”，所以更注重陆上利益，忽视海洋利益，海上权力的建设历代没有成绩，远不如欧洲海权国

¹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19 页。

²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13 页。

³ 马汉著，李少彦、董绍峰、徐朵等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海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 页。

⁴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19 页。

⁵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19 页。

家。¹其次是英国人作为岛国国民，具有很强的海洋忧患意识，“有感觉和列强们斗争的危险”，也因此拥有团结对外的凝聚力，“一呼四应，听召听集”。中国作为长期统一的大陆国家，忧患意识很弱，也因此很少有团结之心，“所以首尾不相应”。²林子贞认为这是中英两国先天地理位置使然，同样作为岛国的日本，也有与英国相似的特点，而作为大陆国家的法国，则有与中国相似的特点。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类似于英、日这样特点的族群。例如南方的福建人，就是近水吃水，具有明显的海洋族群的思维，因此“也是南省较有进步，历任的海军总长都是福建人”³。但总体来说，中国人仍然是大陆思维为主的民族。

中国落后的政治能力抵消了优越的港口地形构成。林子贞认为，仅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并不能决定国家海权的兴盛，也需要合适的深水港湾，才能促进构成海权的商业和海军力两个因素的发展，“一个港湾都没有的国家，不但没有海上贸易上的利益，就是海军也不能扩张，要不了制海权，与国际间不能保守其交通路线，而且无隙可守，敌舰一时来袭，岌岌可危”⁴。英国海权的强大，也得益于富有深水港湾，航行便利，贸易上也能联合起来，而且英国在外占领的无数岛屿也与本土的港湾相联络，形成了港口网，因此在海洋上占尽优势。反观中国，也有不少优良的港口，但是商业和海军力两方面都无法发展。究其原因，“既盲目于前，而又忙杀于后”。传统时代的中国人蒙昧于海权思想，对于海港的防务和利用并未好好重视，因此被西方打破国门。之后又受到不平等条约的羁绊，导致中国的最优良港口被西方控制在手中，成为其沿海据点。这样外国军舰、商船可以进入中国内河，导致中国在海防上无险可守，在商贸上也抵挡不住外资的输入。不仅使中国的航运业衰退，工商业与公共事业操于外人之手，也使得西方人能够更顺利地 from 各方面扰乱和控制中国。当中国的海权思想觉醒之时，却又遇到军阀割据混战的时局，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军政的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军阀相互攻伐，使中国保持分裂的局面，沦陷的港口收复无望，众多港口也无力开发和形成贸易网络，导致中国的海军力与商业力量都迟迟无法统一，海上权力更无从谈起。在海港问题上，孙中山同样指出西方凭借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优良港口，“吾国海军诸港如旅顺、威海、胶州湾、广州湾等地，次第借租于外国，其余可为海军根据

¹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21 页。

²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21 页。

³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21 页。

⁴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21 页。

地者无几，倘再舍此而不顾，恐后患有不可胜言者”¹，认为中国需要政府需要努力建设近代化港口，并踌躇满志地提出了建设世界级大港的计划。林子贞在见证了民国时代的乱象后则认为，国家建设港口的前提在于内政的改良，否则尽管中国地形优良，但是政治的不良和人心的姑息，让港口建设无从谈起，不仅无法增强海上权力，反而为列强入侵中国提供了便利。

中国民间航海人员的不发达，影响了海军力等海权因素的发展。林子贞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在海上生活的人数极多，因此其民众对于海洋是相当熟悉的，这使得英国既渔业、航海业等海洋相关产业上居于领先地位，也使得海上权力所需要的从业者众多：“关于舰船技术上有经验、有熟练的工手、水夫，比别国还多，这些人皆有海上乘组员的资格。有经验，容易训练，一旦有事，募集兵力就快，无论水夫、机关士、兵员和工人。有经验的人数，在世界上，英国可以占了顶多的首位。”²正是英国拥有着来自民间的充足的航海人员，在海权所需要的海军与商船队等方面就有了足够的预备力量，而这些合格的后备军不是其他国家临时能招募到的，因此这也是英国海权强盛的因素之一。正在紧追的日本，也在基础教育中加强了航海素养的培养，“孩子在小学堂念书的时候，就教他泅水，和宣传海国的兵谈”。反观中国，作为农耕为主的大陆国家，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较少与海洋相接触，故民众对于海洋的熟悉度低，就导致了航海人员的不发达，进而无法支持海上权力的拓展。特别是中国的北方人，与海洋的关系更为疏远，“百人之中，没有三两个会下水的，而一旦叫他乘船、放枪，还是不惯，那里有修理改造的能力”？³因此，在民族的海洋性方面而言，中国人显然是落后的，“世界上没有比中国再下的，同时没有比英国再发达的”。不过这是大陆国家的通病，俄罗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四是中国国民的特性不利于发展海权。林子贞认为，国家海权发展背后的驱动力是国民的需求和努力，而这与国民本身的特性息息相关。海上权力的消长，与商业这个主要影响因素的振兴相关，中国当前的商业本身存在弱点，例如生产上缺乏创造力，销售上便货为主，且外国生产的居多；在贸易上年年入超，导致国内财力日益枯竭。在与海权相关的方面，存在着制造业不发达、不会开拓富源、

¹ 孙中山：《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孙中山全集》（卷二），中华书局 1982 版，第 564 页。

²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23 页。

³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23 页。

开拓殖民地的精神缺乏、不注重航海业这四大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对于海权扩张的需求不足的原因，其根源则在于国民性。首先是中国人缺乏开拓进取的商业精神。英国人为追逐商业利益到处开拓富源，在本国大兴制造业和扩张生产力，在国外也注意启发富源，这就是拓殖殖民地的基础。为了将本国与殖民地联络起来，就要奖励造船业、扩张海运，同时为了保障海运，商业也负担了一部分军费，来运筹海军备，又使海军力和商业能够良性互补，这就能造就海上权力的强大。在海权争霸中，除军事手段外，英国人也利用商业来跟外国竞争，垄断海洋上的霸业。相比而言，中国人的商业进取精神就差了很多，除了一部分南方人能够“跃出海外冒险，在南洋占了大部分的实力”，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抱持着农业社会的思维，安土重迁。因此中国人内在的对外商业意愿不足，这是根本上限制了海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是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英国国民能把国家生活上的命脉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能够上下相承协力团结，在海外贸易方面能有兼顾本国公司利益的觉悟，自觉注重维护本国商业发展，清楚知道“建设英帝国与商业的发达，就是我海军之勇敢，即海上我优势地位”。因为英国人深知本国海上权力的强大，是关系到每一个国民的命运：“大英国现在有这些人口，而得安全存在者，握有外国贸易和世界上的运输业哪。若一旦失败呢？这两个大业一定被他国民夺了去，这么一来，英国的劳动者大部分必陷于饥饿。”林子贞认为，在海权这样的战略问题上，英国人能够看到长远和全局上来考虑利益，将海权看成国家兴衰的命脉，并与普通劳动者的温饱联系起来，因此国民能够积极为国家海权的强大服务。相比英国人能够“想到千百年后的饱腹”，中国人却只是专注于眼前的事情，缺乏对于国家发展长远的眼光，因此对于需要长期积累拓展的海权事业就不会重视。而且中国人因为缺乏国家观念，并不会为其他国民的命运而奋斗，因此“绝叫饥饿也没人答应”。此外，英国人具有尚武精神，国内民气振奋，但是不爱内斗，也不会为害本国，“没有几个情愿替外国打自己的”。而中国人缺乏尚武风气，导致民气不振，“大半是逸豫偷闲的堕民”，这也是需要积极向外拓展的海权事业缺乏动力的一个原因，虽然在近代西欧科学知识东渐过程中正在慢慢改良，但是相比海洋国家的国民仍然差距很大。

五是中国政府在海权事业上的消极作为。林子贞认为，海权强国的政府，是为“海上飞跃之国民”来服务的，并努力增强国家的海权力量，为国民提供保障

和创造条件。政府应该为海外开拓富源的国民提供方便和保护，例如很多欧洲国家设有移民局，专理海外国民的组织事务。但中国政府海权意识极差，“比民间还不晓得海外大事”，更不必提去采用奖励等措施为国民提供帮助，而是任由国民自己去开拓，“这是对外民气不能进步的大缺点”。英国政府的组织、制度和方针政策，可以与国民的要求和精神始终协调和一贯，因此对于扩展海上权力的方针，也能持之以恒地努力，“唯以进取为目的”。法国海上权力争夺中败给英国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海权政策的起伏多变，导致了海权建设无法持续推进。相比英法而言，中国的这个问题更为严重，民国政府所有的大政方针都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中国政府的统治方针，朝令暮改；中国政纲的推移，好像浮萍的飘荡，没有定所”。而且传统以来的中国政府始终专注于解决内部问题，而没有精力关注海上权力这样向外发展的问题，“清朝的腐败，民国的紊乱，内顾尚不能消忧，那里有功夫觊觎外洋”？¹英国政府不仅能够一以贯之地为国民的海外事业服务，还能够“立在指导者的地位，发挥良能，瞻望一匡世界”，以国家的力量经略海外，为海权事业预先铺设道路，例如铁道政策等，为海权的海外经略中施以各种计谋，积极博得胜利。反观中国政府对海权事务就非常消极，“唯以‘公理战胜’四个字看做无上的招牌，凡事总要等到教学界和民间的反响之后，方敢露出声色，敷衍下台”。即使消极应对海权事务时，公务人员也缺乏效率，“一部分吏员，恋栈贪耻，在个人的范围内角逐声色，或坐领干薪，或徒争党阀，国家观念付之伊于胡底”。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有志青年来监督丧权的政府，与民间协力防御外侮。

五、发展中国：建设海权与振兴国力

林子贞在书中始终强调，虽然中国的海权现状令人失望，其建设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中国要走向富强，加强海权建设是必然的选择。该书第七章《各国扩张海上权力的目的》中，林子贞论述了进入近世海洋时代之后，各国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海权建设，来达到国家强大的各种目的。林子贞在每一方面都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海上权力的扩张是各强国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亟待图强的中国不得不紧跟这个趋势，而且只有发展了海权，才能解决现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¹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28 页。

林子贞从现代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论述了现代国家与海权的关系，提出海上权力的扩张与争夺，都是文明臻于极致的表现。国家是人类的社会共同体，成立之后自然具有了“独立、自尊和排外的倾向”，为了国民的发展需求，当遇到与其他团体竞争时，国民选出的国家政府就不得不扶植自家的势力，并抵制外界的入侵，海上权力也是其中之一。林子贞认为政府是没有“爱他主义”的，“政府因为当了人民利益的管理者，故先要求其保护者，即人民之相当的利益”。¹向海外的发展是政府的政治力为经济力的发达服务，和各国民的关系是“死活的问题”，“人口的增殖，终要驱逐我们建立新目的，由大陆的势力，一跃到世界的势力”。当本国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就需要海上权力来保护，“要在自由海上得了势力”²。所以海上权力首先是人类文明进步后的产物，即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府为其民众的利益，动用政治权力来进行保障。以后进强国德国为例，要弥补国内因人口增加而造成的物资不足，就需要从海外输入原料品、寻觅商业市场，于是就产生了占据生产地、得到切实的市场、安全输入粮食物资保障的需求。德国收获了海外贸易带来的大量利益³，就必然需要有海上安全保证，也即需要海上权力的扩张来获得，这是政府为了替国民获得工商业上的优势，加强海军力也是为工商业占据和维持占领地，因为“海军力，就是一个海上的保险者”⁴。

各国都在扩张和保持海权的情况下，必然为争夺商业和市场发生冲突，这时候国家就要动用武力了。所谓“社会的状态，先由野蛮的状态，移于文明的状态。文明极，则野蛮生，在这时候一转轮，再由文明的状态，转于野蛮的状态”⁵，此时海权国家既要和海权争夺者作战，也常常要对不服从控制的殖民地作战。例如德国想要获得海上安全，就不得不与英国斗争，因为英国占据海上权力而形成的霸权，威胁到了德国的商业命运。同样英国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也不得不与德国斗争，因为两国是商业上的竞争者，也是海权的竞争者。在这种野蛮的对抗中，文明时代所设立的各种国际法规和国际裁判所就无效了，因此就不能寄希望于公理和公法，只凭国势强弱，“优胜者赢，劣者就败灭，因而道德的规范，可就陷于国际间的欲壑了”。⁶

¹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2 页。

²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3 页。

³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3 页。

⁴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3 页。

⁵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1 页。

⁶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1 页。

海权的扩张与争夺，实际上是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一个国家对内文明发展至对外野蛮的状态。当前中国急于进入文明世界，就必然需要发展海权，同时也需要做好应对列强野蛮争夺的准备。中国海权的建设，将在多个方面为中国国力的振兴发展带来利益。

第一是伸张国势。林子贞认为，古代中国实施海禁政策，而且交通不便，因此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境内大陆就能维持社会的安全生活。但是当国家的国民数量膨胀、国内产业发达起来的时候，“有人没有地方去安置，有物没有地方去拍卖”，国民就有向海外发展的需要。因此西方列强的政府都会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海外发展，例如奖励航海业、造船、搬运移民和产物，去海外市场获利。再进一步，就要采取侵略态势，用已经增强的海上权力去“垄断海外商场的霸权，掠夺他国民的财产”。遇到他国争夺市场时，就要用军事手段去征服他国了。这些扩张步骤的结果，就是“延长自国的国境和势力”，来获得本土无法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利益。林子贞认为，中国要解决当前的发展问题，也要学习海洋国家，“制海权一定要超越于自国的领水外”，要建设大海军和商船，这两样就是伸张国势的利器，战时与平时皆可并用¹。在国内则要鼓励向外发展的需求，奖励国内产业的发达，而生产业的发达又能促成政府财政的活跃，增强海权扩展的能力。

第二是争夺商业上的霸权。列国为了伸张国势，就要扩张航海业，并组织生产产业，到世界市场上与外国争夺商业的霸权，破坏外国的工商业发达，奖励制造输出、外国原料品的输入，以及合理运用国内的财富，这是各海权强国的共同倾向。相反中国成为了列强角逐的地方，“比方中国的棉花，先输出日本国一次，待日本国制造成纱之后，才输入中国内地拍卖的样子”。²正是因为中国成为了列强的角逐市场，压制了中国自己工业，导致纱业资本短少，容易被外国商业力量所扑灭。比如上海有很多棉花纺织工厂，但是“大利还是被了外国的资本家、企业家占了去”。³林子贞认为，这种商业竞争，不是寻常的竞争，在商业力量的背后，“要有敏活兼巧妙之政府的指导”。中国可以借鉴法国发展海权的经验，由政府来推进产业进步，“先要认定专门熟练的人才，强行最良好的生产方法，制出最良好的货物的样子”，生产出具备实用、好看、便宜的货物，具备了与外国竞

¹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4 页。

²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5 页。

³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5 页。

争的价值，就可搬出海外销售。

第三是实施海外移民政策。林子贞认为，当人口激增之后，向海外移民仍然是国民的重要需求，依靠海上权力实施海外移民政策，则是对中国发展极为有利的措施。各国利用移民的政策，把一部分积极或被迫向海外发展的国民，即“活跃或无告的分子”，奖励出洋工作。在年久日深之后，海外移民中的有资者可以回国，无资者在海外也能获得生活，而穷极之人也可以请求该国外交官的保护，送其回国。实施移民政策，在国内可以解决生产力困难的问题，在国外有了发展之后的移民，可以扶植本国海上权力的依靠力量。移民在国外拥有资产的，也会将资产运回本国，有利于增加母国的财富，日本在美洲的移民、中国在南洋的华侨都是这么做的。不同的是，世界强国多有系统的移民政策，比如颁布移民条例、为移民预备一定的辅助金，而中国没有这方面的经世政策，只能放任海外谋生的国民自发出海、自谋生路、自生自灭。¹ 闽粤地区长期以来就有对外开放、鼓励移民的传统²，林子贞与其先辈有一脉相承之处，但补充认为现代国家必须运用海权力量推动移民政策，改变传统中国对海外移民的蔑视和放任的态度。一方面是需要中国的海权力来保护华侨在海外的利益，华侨没有得到自己国家的保护，只能依靠外国的航运冒险出海，并寄生于外国人的歧视制度之下。华侨集款支持孙中山革命，正是因在国外感受到无法得到国家有力保护的痛苦，而期望革命党能够改革国内的劣政。而国内政局长期不稳，不仅不能扩展海权支援海外华侨，也导致有资的华侨因得不到安全保证而拒绝回国，海外的财富无法回流国内，“还是外洋钱，在外洋得，在外洋用”³。另一方面要限制外国同样利用移民政策在中国扩张势力。海权强国对于外国移民的进入是极为警惕的，中国人要到美英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去，就得先缴纳保证金，或者有外国籍同胞的引领，才能登陆。相比而言，中国对于外国移民却放任自由，“不管那一国的人都可以遂便住的，世界上各国政府的经略再没有比这个那么失打算的”⁴。日本人难以进入英国的

¹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8 页。

² 清初漳浦人蓝鼎元就认为“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不应实施海禁而应鼓励居民赴海外谋生，这样才是利国利民，“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清】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初集》卷三）。南靖人庄亨阳也认为“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用。……我民兴贩到彼，多得厚利以归，以未归者，或在彼处为甲必丹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贍家。”（【清】庄亨阳：《禁洋私议》，《秋水堂遗集》卷三。）

³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9 页。

⁴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49 页。

领地，却以日支亲善的旗号将大约三十多万日本人移住中国，而且在此自由地生活；反之中国人往日本移民时，日本政府却不承认所谓的亲善，极力限制入境。外国人可以随便在中国开设银行、开矿山，中国人在外国却不容易办到同样的事业，无法扶植中国的势力，这也是海权强弱的体现。

第四是保护工商业与海上贸易。林子贞认为，海权强国利用海上权力与其他各种手段配合保护了本国商业的发展，是值得中国学习的。英国在工商业发展的初期颁布的《航海条例》就规定：由欧洲大陆输入英国的货物，要用英国的船只搬运，反之若用原产地国的船舶搬运的商品，要加两倍的进口税；在英国领土沿岸进行的贸易，不准用外国船；外国船捕获进口的鱼类，要加两倍的进口税；在英国殖民地往来的船舶，限制为乘组员三分之二以上是英人的英国船只方可。英国正是在逐步成长的强大海权保护下，辅之以保护商业的关税制度和航运制度，达到了奖励输出制造品和抑制外货输入的双重目的，使国内的工商业免受打击。中国工商业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海上权力的保障，导致税收和航运上反被外国占了优势。在税收上，“比方外国人搬运进口货物，值百抽五。但是中国人搬运进口的货，可就要抽十抽十五”，而且“中国的商家有铺捐，而外国人就没有”，这就导致中国的货价远高于外国货。在航运上，“外国的货有外国的船运到海外去，中国的货没有中国的船，走不了水路，销售不能如意”，这也抑制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同时，航海业也充满着诸如海盗、敌国、远洋风浪等危险，中国的海上贸易也需要海军力的保护，不论战时还是平时，都需要海军来增强商船防御能力和灾害救助能力。因此中国要保护工商业的利益，“非扩张海权不可，非改订税率不可，非奖励输出不可，非扩张航海业不可”¹。没有海权的安全保障，在海上的商业能力受到限制，又会反过来抑制航海业和海军的发展，“养不了那些航海人员，亦没有大海军的希望”，而海上贸易失去保障，则会导致国家工商业的衰退，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

第五是具有报复和报仇的能力。报复是强制性处理国际纠纷的手段，例如中国的货物出口到英国时，英国海关要加倍收税，那么英国的出口货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也可以用反报的手段，给英国货上加倍的进口税，以迫使中英贸易回到公平的局面。但是外国凭借海权首先迫使中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羁束，导致关

¹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56 页。

税不能自主，近代中国多次试图调整关税的努力，也因为受到外国海权的威慑而归于失败。现今广东政府准备用强制的反报英货的方式报复时，恐怕也无法坚持到底¹，而北洋政府的关税部门更是对关税丝毫不敢动手，“姑且屈伏在洋大人宝刀下”，不能够保护中国工商业的利益。这本来是中国的“正当防卫”，但是受制于海上权力的弱小而不得伸张。因此中国不能不扩展自己的海上权力，才有反报对方不平等措施的能力与希望。报仇是比报复更宽的概念，是在使用平和手段抵制无望的时候，用海军力的武力威慑去让对方让步。最为常用的办法，就是用强大的海军去封锁对方的港口和领海，或者断绝其沿岸和公海的交通，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根据国际法，这种报仇的前提或是在某个事件上中国国民吃了别国的亏，需要对方国家或国民作出赔偿而被拒绝的时候，或是他国在国家层面以不正当手段加害中国，造成了严重损害的纠纷，需要用强制手段进行强烈报复的时候。但是现在列强凭借强大的海上权力，不顾有无正当性与合法性，用报仇的手段先侵略他国。例如英国在 19 世纪与法国开战前，恐怕荷兰与法国联盟而先扣押其船只，日俄战争日本尚未宣战之时即捕获俄国船舶，这些都不符合国际法。因此深受列强侵略的中国，不能迷信国际法的效力，如不赶紧扩张海上权力，没有报复和报仇的能力，不但在被欺凌时无法有还手之力，还有被列强封锁的危险。

第六是以海上权力保护中国作为独立国的主权。独立国家的国家主权具有最高的地位，独立国所管辖的领域，包括领土、领水、领空和船舶都是具有独立性、排他性，以及自强的性质。然而当国家受到他国的国势伸张而受制于人时，主权又被损害，降为最低的地位。中国被列强打开门户，引盗入宅之后，列强反客为主，把中国的主权剥夺殆尽：在各个租借地，中国并无主权可言，反而要服从租借国的约束；中国的炮台、要塞等各种海防设施以及领水，若是妨碍了外国轮船的交通，也要被撤去，“给洋大人满意”；中国的内政、外交，也被列强随意干涉，无法自主。因此中国名义上还是独立国，但其实已经是列强的保护国了。随着政治上的弱势，中国的工商业也立于这块已成为半殖民地的国土之上，虽然领土大、民众多、产物盛，但反而屈居于世界的落伍者的地位，没有保障可言。林子贞认为，中国人历年以来试图依靠公理救国，在国际上为治外法权的收回、关税自主

¹ 书中林子贞所指的广东政府的报复行为，应为 1926 年广东国民政府开征“二·五”附加税事件。事实上林子贞对此次外交纷争“无法坚持到底”的判断并不准确，在北伐形势顺利和国民政府态度强硬的情况下，开征“二·五”附加税最后获得了成功。

等问题疾呼，希望列强能够同情，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让国家颜面扫地，“好像一个高等的要饭的，要求施主家的饭，流了许多的血泪，才能够医治一时的饥饿，完全失了独立国的威信”¹。回顾历史，国家的独立是依靠海上权力来实现的，如果中国在海权问题上有了相当的认识和防备，中外国势自然均衡，也就没有今天的痛苦了。历史的教训告诉中国人，要达到保护独立国主权的目，就必须壮大自己的海上权力，这在海权扩张的目的中属于最基本的要求。

林子贞反复强调，海上权力的增强，不仅仅是国人普遍认为的需要政府加大对海军的投入、对军港的建设等，让国家的海上权力去发挥本身的各项作用，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而以此强大起来的国力又会回报和反哺给海上权力，这是两者互相促进的。例如用海军力来保护工商业和海上贸易、用报复等手段来保护关税、支援华侨而扶植海外力量、保护主权而维护领海等都有助于振兴中国国力，又间接地从财力物力、人员储备、战略布局等方面增强了中国的海上权力。

六、结语

九一八事变之后，外敌从陆上的逼侵面临的亡国危机，使中国知识界对于海权的讨论已逐渐淡去，惟有陈绍宽等海军人士仍在极力呼吁重视海权。20 年代末问世的《海上权力论》，就成为近代知识人论述海权的绝唱和集大成者。此书虽然不是鸿篇巨著，但与同一时代的海权论说相比，具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鲜明的论述风格。

首先，这是第一部立足于中国视角的海权论著作。当时为中国各界所推崇的西方海权理论，是西方历史实践的产物，海权理论界并未基于中国的视角对中国海权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而西学东渐中的中国学界，以西方的海权论和海军军备建设为大旗，动辄高呼国家大力建设海军，与欧美竞雄于海洋，认为海军强即可解决海权问题，显然失于主观和肤浅。作为知识人的林子贞，因其独特的知识结构，在《海上权力论》中以中国的视角分析中国所面临的海权难题，既从西方海权冲击造成的恶果阐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海权危局，又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民族习性、思想观念以及政治体制等中国国情来解析中国海权危机的根源，论述了这个古老陆权国家在向海权国家转型中的艰难性。尽管其某些论述稍显笼统而缺

¹ 林子贞著：《海上权力论》，三星印刷局 1928 年版，第 62 页。

乏实证支持，但这一视角是当时的中国海权学界所缺乏的，也为缺少东方视角的世界海权学说作了补充。

其次，这是中国第一部完整而深入的海权论著作。由于海权论传入中国的不系统性，中国人对于海权理论知识的认识也显得零碎和偏颇，在学界、海军、媒体、政府、地方士绅等群体的表述中，常将海权等同于“海军”、“领海”、“制海权”、“海洋经营权”等。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较为完整地论述了马汉海权论的内涵，并厘清了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是当时少有的清晰地展现海权论实质的著作。基于完整的海权论理念，在中国海权问题的论述中，林子贞提出：西方的海权侵略并不仅仅是从海上叩开国门，向中国内地持续进行的经济侵略同样是海权扩张的延伸；国家海权的竞争并不仅仅是海军力的竞争，更是包括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特别是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国海权发展的本身也会带给国家各个方面的振兴，也同时有利于海权实力的增强。

再次，林子贞的海权思想也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具有“海洋-陆地”二元对立思维。《海上权力论》在宣扬西方海洋文明的现代、民主、开放、团结，而作为对立面的则是中国大陆文明的传统、专制、保守、内斗。虽然林子贞对家乡闽台地区乃至南方的海洋文化给予了肯定，但是基本否定了中国本身的海洋文明历史。同时，由于对当前中国海权的失望和振兴国家的急切心情，又极力提倡去除中国传统陆权思想和现有体制，全盘向西方文明学习，这也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中的知识人们一个常见问题。

最后，林子贞限于知识人本身的局限性，并未提出切实的振兴中国海权的路径。林子贞作为从日本法学专业毕业，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年轻知识人，并未接触过中国海权相关的实际政务。因此《海上权力论》一书尽管在理论上完整阐释了海权理论，并深入地论述了中国建设海权的难处与问题，但尚未就如何振兴中国海权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其旨趣也是希冀在思想观念上对民众有所触动，因此偏于海权启蒙的价值。